

娱乐化模仿社会实验： 生活方式体验类真人秀的功能表达和效果实现

梅笑冰

摘 要：与强调选手间竞争性关系和游戏环节设置的流行歌舞选秀不同，近期热播的亲子类节目也是一个舶来品种，隶属于生活方式体验秀，是侧重对被挑选主人公新环境下现实生活进行表现式纪录的事实性娱乐节目。因为具有明显的纪实色彩，被称为建构式纪录片；因为致力于改变被挑选主人公的生活情境以验证节目方预测，被称为社会实验性节目；在验证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主流健康的先行主题，承担社会责任和教化功能；同时，对体验者、体验环境、体验过程的呈现方式设定标准，制造娱乐效果。

关键词：体验秀；社会实验；功能；效果

作者简介：梅笑冰，女，副教授，文学硕士。（浙江传媒学院 电视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J9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4）04-0128-05

DOI:10.13628/j.cnki.zjcmxb.2014.04.022

在管理者近年来多次严格规范相亲、歌唱舞蹈等才艺选秀的背景下，近期，“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了”等亲子秀和“我是歌手”、“花儿与少年”等明星秀在各卫视密集播出，这些真人秀突破传统娱乐节目的题材领域，节目制作和宣传中刻意强调传统伦理和亲情友情，细致入微地再现核心主人公在规定情境中的日常言行和交往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纪实特色。在类型归属上，它们隶属于一个来源古老、争议巨大、样本稀少的传统真人秀类型：生活方式体验秀。

一、生活方式体验秀在真人秀发展之树上的位置

真人秀全称为“流行的真实电视娱乐节目”，^[1]源自纪录片，是传统纪录片于上世纪80年代适应媒介环境，在媒介产业化、管制解除和技术进步压力下，与流行娱乐节目融合而成的杂交变种。一方面，通过时空限定、规则制约、奖惩激励等途径，真人秀激发快感和观众注意，以获得娱乐效果和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传统纪录片试图通过真实纪录而对社会生活观察、见证、思考、批判甚至修补、实验、重塑的企图。目标差异，导致真人秀形成侧重游戏与侧重纪录两种发展方向。

游戏竞赛类真人秀（Game Show 或 gamedoc）重视与现实日常生活相对隔绝独立情境下的游戏规则设计、严密程序安排和固定模式延续，强调选手的志愿参与、低门槛进入、数量大、才艺优、有梦想，鼓励选手间激烈竞争对抗，侧重表现程序过程中逐渐被凸显的核心选手的戏剧性变化。在2013年亲子和明星体验秀播出之前，国内真人秀几乎全部归属此类。

纪录片式的真人秀又名现实生活类真人秀或建构/建构式纪录片（Constructed Documentaries 或 docushow）。节目慎重挑选并劝服少量而固定的核心志愿者，置身于相对开放的日常生活情境中，设置任务，观察、纪录任务完成全过程，以遵循日常生活逻辑的情感波动、言行反应、性格特色展现以及主体间互动关系为纪录重点。主要包括三个子类型：纪实偷拍秀，生活技能秀，生活方式体验秀或称社会实验性节目，以上提到亲子秀和明星秀就隶属于此第三个子类型。

当然，在典型游戏秀与纪录秀的中间地带，许多节目兼顾游戏和纪录。如人际关系考验秀“老大哥”（Endemol）、“完美假期”（湖南经视），约会秀“不见不散”（江苏卫视）等。

作为侧重纪录的现实生活秀之子类型的生活方式体验秀，是对被挑选少数主人公个体，在被安排的体

验情境中，心理体验过程的纪录和展示。体验者的言行和心理，需要节目方等待、捕捉、纪录并予以引导或解释，拍摄纪录等待的过程漫长，后期剪辑加工解释又容易产生歧义并引发争议，节目娱乐效果的实现依赖观众主动发现参与，并耐心等待体验过程的缓慢酝酿发酵；节目制作难度大，风险高，效果不直接可见，因此国内外体验秀的数量都很少。^① 2013 年末这轮亲子和明星体验秀的播出，填补和丰富了国内真人秀类型领域，在各种竞赛秀重复建设、观众审美疲劳后，以不一样的功能追求和节目设置拓展了观众对真人秀的期待视野。

二、体验秀的社会实验色彩

体验秀全称为“生活方式体验类真人秀 (Lifestyle Show)”，^[2] 节目建立在对主人公生活方式的类型化判断和假设之上。即在节目内容模式上，首先假定主人公之前的生活方式存在某种不同程度的物质或精神缺憾，如贫穷或残疾等缺陷导致的生活困境，事业学业之失败，厌学、厌家，人际交往障碍，与人生意义价值缺失伴随的无力和迷惘，甚至是对现有日常生活因习惯而生出的麻木、厌倦和疏离。体验秀以对以上缺憾的证明、确定和强调开端，把改变以上缺憾塑造成为主人公志愿参加的动机，同时也是节目制作的切入口和贯彻主题。节目方通过人为改变和限定生活环境、条件和关系人，促成志愿主人公的个人体验，激发并纪录主人公在言、行、思、情各方面的反应和变化，最终见证其可预期的改变，在此戏剧化改变过程中捕捉娱乐价值。

体验秀的节目设计思路为提出假设—创造情境—验证假设—得出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由节目方设计主持的一项社会实验：节目方（实验设计者）预先假设主人公（实验对象和主体）在新环境下（实验情境）改变的方向和程度，设计刺激因素（自变量），以引发主人公的反应（因变量），纪录反应和变化（实验过程），印证节目方和观众对于主人公改变的预期（获得实验结果）。在此种意义上，体验秀又被称为“社会实验性节目”。

探究源头，“实验法的思想根植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范式，…是在高度控制的条件下揭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适合测量短时间范围内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特征”。^[3] 实验法在社会人文学科的广泛应用，显示出现代人对自身及其所居于其中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可被分解、建构并理解、掌握的一种自信。亲子体验秀模仿社会实验，遵循假设—实验—求证的节目设计理念，这直接决定，节目方必须对主人公及其现实生活进行明确的价值判断、道德评价，并由此制造争议话题，实现舆论方向引导。即相比较于真人秀其他子类型的强调竞赛和游戏元素，实验性节目在本性上强调的是态度选择和社会担当，它继承了真人秀古老而纯正的血统，在源起上，作为“纪录片部门的创意，源自对某种人生困境的觉察并试图探讨解决的途径”，^[4] 隐喻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

三、体验秀在模仿社会实验过程中的娱乐化倾向

但体验秀绝非真正的社会实验，在实验对象获取、信息告知和隐私权益保护、实验条件控制、变量限制、变量数量设置方面、在实验结果推导过程的严谨性和可重复验证性方面，二者差异巨大。在商业、管理等压力下，体验秀节目方严格自律，以吸引最大多数受众为原则，健康向上的主题先行，有

① 体验秀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案例稀少，2013 年前节目案例主要有三类：其一，妻子交换体验：2003 年英国 Channel 4，2004 年美国 ABC、FOX，分别播出主妇交换秀，2012 年 FOX 推出升级版“名人换妻”。韩国 MBC2008 年开始播出“我们结婚了”，让明星假想体验婚姻生活。同年齐鲁台制作城乡互换的“交换主妇”。其二，亲子体验：国内始于 2005 年北京青少频道“相约新家庭”。湖南卫视 2006 年起至今断续播出“生活角色互换节目 变形计”。2012 年江苏卫视“花样年华”城市女孩穷困生活体验。2003 年起深圳卫视“饭没了秀之宝贝赖上大明星”。2013 年陕西卫视父子沟通秀“好爸爸坏爸爸”。其三，企业高低职位互换体验：2010 年 CBS“卧底老板”。2013 年江苏卫视，商界精英为了“蓝天碧水间”生态环保主题而体验基层创业。2013 年后体验秀案例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亲子体验秀：青海卫视“老爸老妈看我的”，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浙江卫视“星星知我心”、“人生第一次”、“爸爸回来了”等。二是，明星体验秀“星跳水立方”、“中国星跳跃”、“我是歌手”、“花儿与少年”等。

选择地设计、再现、解释和引导实验过程,印证预设。体验秀对社会实验的娱乐化模仿和改造主要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体验主体的选择标准,第二,控制体验过程记录中的多义性和导向性;第三,设计和控制体验情境。

(一) 从青少年、边缘人到儿童、娱乐明星:体验主体类型及其问题

在实验对象的选择方面,真正的社会实验强调在实验任务目标范围内随机获取以防止偏差,保证实验结果普遍有效。

传统体验秀倾向于挑选边缘人物以获得关注度和争议性。“变形记”、“相约新家庭”、“花样年华”、“好爸爸坏爸爸”是国内比较有代表性、形态较为成熟的生活角色互换秀,互换反方常被标签为网瘾、厌学、暴力、拜物、叛逆、交往困难、问题少年、富家子女,正方则是家境贫困、封闭、苦难、善良。节目方刻意强调两层巨大反差以获得戏剧性:互换前的生活境遇和状态反差,互换前后的改变对比反差。

年龄方面,选择处于青春叛逆迷惘期的少年、青年为主要主人公,置之于传统核心家庭中,重点纪录其与家长辈交往过程中的冲突和妥协;节目的主题目标设定为让边缘人回归主流,帮助青春期青少年成长成熟而实现社会化。

但在传统体验秀的实际操作中,选择边缘的叛逆青少年作为实验主人公,往往引发巨大的社会争议,让节目方陷入无法避免的道德困境,损害播出平台的公益形象,这也是长久以来国内体验秀节目案例稀少的主要原因。如制作规律上要求强调变形前后巨大反差,为此,节目强行闯入并破坏主人公旧有的生存境遇,拉其进入幻境般富足奢靡的城市风景或奇观式的贫困境遇,导致体验者价值观念和情绪的剧烈波动和重新审定。为平息争议,树立正面形象,节目方一方面宣称提供心理、情感和生活援助;另一方面,竭力引导观众正面的理解方向,感受人间温暖,修复家庭和社会关系,恢复信心,相信善意,回归主流意识形态。

近期体验秀找到规避以上风险的捷径,全面替换体验者类型,压低体验主人公年龄层次,同时修改边缘人为主流人群以至于娱乐明星,如“爸爸去哪儿”、“星星知我心”、“人生第一次”、“老爸老妈看我的”、“爸爸回来了”等亲子体验秀。节目方重点表现学前儿童甚至婴儿的天真可爱,父母教养中的小问题、小烦恼,利用观众对星爸星妈的追星和好奇心理,制造轻松愉悦的观看感受,借此规避贫富、城乡等社会差异和争议话题,绕开传统体验秀无法回避的现实生活中荆棘一面。

同理,英美的争议家庭“换妻秀”变为“名人换妻秀”,韩国婚姻体验秀“我们结婚了”等节目,也同样走明星体验路线。某种程度上,演艺明星体验“跳水秀”,成名已久歌星重新体验歌唱比赛竞争,重回“我是歌手”初衷,商界大腕重新体验创业秀“赢在中国蓝天碧水间”,明星姐弟自助远行秀“花儿与少年”等,都致力于挑选明星为主人公,在新情境、新领域中体验新任务。节目方通过有意识地把传统体验秀的生活困境和现实任务,替换为明星体验秀的游戏困境和节目任务,以此排除争议和道德风险。同时改变体验志愿者类型和选择标准,修改关注重心,专注娱乐。近来节目观众、媒介和研究者的主流意见,认同此类亲子和明星体验秀的所谓“成功”,可以看作以上替换和修改策略之取得成效的标志。当然,节目方与明星父母的薪酬关系及对学前儿童权益的影响,仍是一个潜在的问题炸弹。

(二) 多义性和导向性:对体验过程的纪录和加工

真正的实验法是假设和验证变量间可被量化的因果关系,自变量和因变量数量少而固定。

体验秀节目方往往大肆宣扬对体验过程的忠实纪录,号称“观察式纪录片”。但后者采纳低介入的创作手法,其基本原则是“避免用预设的观念或宣传目的来审视素材,让素材成为观点的影像例证,而是通过发掘素材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让纷乱、琐碎、司空见惯的真实的现实生活中蕴含的意义、故事甚至戏剧性自动凸显,并据此作为逻辑线索审视和选择素材”。^[5]与之不同,体验秀变量笼统,主题先行,节目方主导实验方向、寻找和制造证据,证明节目设计,一般思路为:挑战任务,共享经历,

感受美好,验证“温暖、健康、积极、向上的正能量”(陕西卫视频道副总监郑毅谈“好爸爸坏爸爸”节目诉求)。如“变形记”、“花样年华”节目方化身“我们”,用第一人称解说者身份直白地表达对体验主人公言行情思的预测、评价;甚至编导入画直接指导体验者。“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了”、“花儿与少年”通过后期剪辑、字幕、配乐方式引导观感。“我们结婚了”设置演播室嘉宾作示范观众。“老爸老妈看我的”中有一个人称混乱的童声心理独白者。

虽然节目方表露出控制节目方向的强烈意愿,并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得成功,但体验秀对纪实性拍摄表现手段的倚赖,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实验性节目或多或少保留了多义性。尤其近年来欧美体验秀明显趋向于减少主观性影响因素,如解说、字幕、配乐、剪辑中的对比和联想暗示,更重视通过任务设置、流程安排实现间接控制,多采纳现场追述等方式强化纪实性,引导观众关注内容本身,尽量保持节目内涵的丰富性和开放性。如“卧底老板”用表面借口“纪录片小组想要拍摄一名文员如何应付体力工作”骗过大多数被拍摄者,获得比较真实自然的当事人表现。“名人换妻”、韩国版“爸爸我们去哪儿”弱化外在物质条件差异,侧重展示不同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对比变化。用主人公名字命名的“杰德·古迪秀”(维珍集团生活频道 Living TV)实拍罹患癌症的体验主人公真正的婚礼和葬礼秀,让真人秀成为真正的所谓“生活方式秀”,引发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交锋。^[6]

有研究者对真人秀命名进行词根溯源,认为“reality 更多所指的并不是‘真实性’,而是促使某事发生的一种‘权力’”,^[7]真人秀节目是商业、管理体制、流行文化、制作者和观众等各种势力进行权力争夺和分配的场域。国内体验秀之“秀”究竟是要侧重“人为导演和表演”,抑或侧重“给…看”、“表明”、“显示”等中性含义,此种选择显示出在权力争夺中各方的立场、策略和力量。生活方式体验秀以纪录为宗旨和表现手段,节目方作为最大权力的拥有和实施者,应该控制权力表达的方式和度量,在事实纪录中,保护信息的完整性和多义性,留有回旋余地,追求更加丰富的收看感受和更充分的互动性,从而吸引多层次受众群体,展开讨论和争议,尊重观众的智力和选择,让观众自己做出判断,得出主流结论,这比生硬强加的效果要更深入持久。如此形成良性循环,有助于体验秀维持其流行、先进的节目类型状态,同时承担更多样的社会责任。

(三) 环境控制: 节目体验情境与真实日常生活环境的交叉隔离及其意味

实验法通过设计实验过程、控制实验环境,排除干扰因素,以求获得实验对象在近似于日常生活环境下的真实反应。

体验秀节目方与体验明星之间存在直接雇佣薪酬或间接互利合作关系;因为明星档期紧张,节目无法像低介入式纪录片,维持相对较长的拍摄周期,使拍摄对象忽略摄像机进入日常状态;明星的工作性质也决定了他们了解规则,在被拍摄状态下更易变通以保护自己并获得最大利益;同等条件下,明星家人也更善于应对节目拍摄。体验秀是娱乐节目,以娱乐性为重要原则,节目方致力于寻找、发现在设定任务和情境下的戏剧性和故事性,在此强烈动机下,与体验者达成默契,人为增加环境干扰因素,激发矛盾,促使冲突发生,以增加体验感受的烈度,即节目方采纳高介入式创作手法,更加精准地进行环境控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明星旧有生活环境的剔除和重新建构,二是净空明星体验地的自然和人际交往环境。

传统体验秀如“变形记”,在节目模式上强调体验前后对比,以参加节目前主人公之种种顽劣不堪对应受到节目刺激影响后的幡然悔悟改过自新,实现体验节目的戏剧性变化。因此,会重点展示体验者参加节目前的经过节目方浓缩和提炼的日常生活环境。与之不同,明星体验秀在节目模式上,首先,选择直接切断与旧有正常生活间联系而进入节目拍摄状态。如“爸爸去哪儿”,直接从打包行李出门开始,妈妈份额极少或不出镜,过程中与妈妈无电话联系(在这一点上,韩国模版节目更大程度地开放了明星体验者的旧有生活环境,因此节目显得更加真实)。其次,宣传节目存在的现实意义在于“为平日很少有机会呆在一起的父子”制造“拉近距离的难忘时光”。然后,通过强调爸爸的日常生活技能差、经验少,引导、暗示、鼓励观众,去补充臆测,建立对于明星日常生活图景的想象,满足观众的

好奇和偷窥心理。再后,节目方宣称,节目所展现的、观众所看到的,就是明星的日常生活,虽然状况迭出,但皆大欢喜。最后,进一步暗示,这种生活像你我的生活一样,琐碎辛苦但幸福满足,充满正能量。

为了保证明星如上体验过程的正常展开,节目方刻意选择干净的具体体验场所,同时淡化体验者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与当地居民的人际交往,即被体验环境中的当地居民无需出现,无需对话,其话语也无需了解。“爸爸去哪儿”避开围观者众、难以控制的城市环境,挑选偏远乡村,非热门或反季节风景名胜区;杜绝当地少数居民的围观;即便入住民居,也更换被褥,让屋主彻底消失;明星儿童直接闯入当地居民住屋,与主人对话仅限于礼貌用语;甚至居民带有浓厚口音的答话直接以乱码式字幕形式呈现。“花儿与少年”选择境外旅游,因为主人公外语水平大多有限,无法形成交流,即使能够交流,也从不致力于交流。“爸爸回来了”拍摄的主要场所集中在家里、车上、宾馆房间,明星儿童与节目外他人的交流罕见。于是,体验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奇观式的异域风光形式呈现,人文环境及日常生活场景被刻意推远,成为刻板印象中模式化的符号群落。

节目方通过严格控制实验环境,力图给观众造成如下印象:体验者的当下节目生活就是唯一、全部和真实的生活,节目不是“秀”场,而是体验主人公的生活本身。如“爸爸去哪儿”制片人谢涤葵宣称,“不是一个秀、不是一个(娱乐)节目,我们90分钟没有一分钟是经过修饰的,都是孩子们真实的表现”;世熙传媒总裁刘熙晨赞同说,“不是综艺娱乐节目,而是一档货真价实的纪实真人秀,但它比娱乐节目更易触动观众情感和引发社会话题”,体现出“从作秀回归到关注观众、打动观众,引发共鸣”的电视本质。而反对的声音也异常鲜明,如“好爸爸坏爸爸”总导演李莉评价节目为:只去表现“天真可爱、幸福美好”,是一种“童话故事版的生活”。

四、结 语

长期以来,国内真人秀对国外节目模版的引进局限在歌唱、舞蹈、主持等才艺选拔和游戏竞赛领域,忽略了真人秀在源头上与纪录片的因缘关系,以及节目关注日常生活现实,发现人生困境并试图寻找解决途径的初衷。

新兴起的亲子和明星秀,作为侧重现实生活纪录和生活方式体验的社会实验性节目,拓展了真人秀的题材领域、关注范围,把表现重心重新放回纷繁复杂的生活本身,节目模仿社会实验,怀抱特定预期假设,设定假定情境,设计验证过程,进行结论推导,创构式再现体验个体的情绪心理观念和行为转变过程。节目方艰难地寻找商业成功与社会责任担当的平衡点,试图让娱乐有教化意义,使纪实增加故事性、趣味性,于是,每一次新节目的尝试都弥足珍贵。但是,就现有节目来看,节目往往倾向于抓住社会实验的外形,故意修改社会实验的标准与内质,迎合娱乐需求,此种做法,降低了实验节目范式本身潜在的社会实验、批判、警醒和矫正价值,也不利于包纳更加多元的节目内容和价值取向,以吸引更加挑剔的结构型受众。

参考文献:

- [1][澳] Jelle Mast. Documentary at a Crossroads: Reality TV and the Hybridization of Small-Screen Documentary[J]. *Sociology Compass*; e1751-9020, volume3, issue6 2009: 884-898.
- [2][英] 安奈特·希尔. 流行真人秀——真实电视节目受众的定性与定量研究[M]. 赵彦华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8: 13.
- [3] 陈阳. 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165-168.
- [4] 杨晓凌. 洞察观众是最高机密——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电视创新[J]. 传媒 2008(9).
- [5] 梁桂军,邵雯艳. 是接近,而不是干预——简析传统观察式纪录片低介入创作手法[J]. 中国电视 2014(2).
- [6] 英“真人秀”明星杰德·古蒂镜头前结束人生[N]. 新京报 2009-03-24.
- [7] 韩程. 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英美 Reality TV[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3(2).